

国家与社会互动视域下也门萨达部落社会探析

——兼论胡塞武装的兴起*

苏 瑛 赵 澎**

内容提要 胡塞武装是在萨达地区兴起的栽德派宗教政治力量，2015年后从地区叛乱武装迅速崛起为主导也门内战的重要政治力量。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视角下，也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与萨达部落社会的互动体现在：对当地社会控制力的博弈、现代经济对传统部落社会的冲击、萨达青年群体的政治觉醒以及栽德复兴运动等多个方面。胡塞武装的兴起正是萨达地区传统部落社会对现代国家也门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层面实施社会控制做出回应的结果。胡塞武装的发展壮大对也门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胡塞武装 部落社会 社会控制 栽德主义

胡塞武装的前身是1992年侯赛因·胡塞（Hussein al-Houth）在也门萨达地区建立的“青年信仰者”（Believing Youth）组织。“9·11”事件后萨利赫政府与美国建立反恐合作，该组织因强烈的反美立场转变为国内叛乱武装力量。2004年9月，其领导人侯赛因·胡塞被政府军打死后，继任者将“青年信仰者”组织改名为“胡塞人”（Houthi），并与政府军爆发了持续数年的地区战争。2014年9月，胡塞武装利用也门政权过渡时期出现权力真空之机夺取首都萨那并攻占多个省区。2015年3月，以沙特为首的阿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六十五批面上资助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助计划“部落社会与也门现代国家互动关系探究”（2019M653857XB）、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62）的阶段性成果。

** 苏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新疆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拉伯联军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由此形成了胡塞武装与联军支持的哈迪政府对峙的局面。胡塞武装组织强势崛起严重冲击了也门传统政治生态，并对阿拉伯半岛地区稳定构成一系列严峻挑战。国内学界对胡塞武装的研究集中于其发展历程梳理、裁德复兴运动以及地区局势等议题。^① 国外学界的研究侧重于胡塞武装的性质、地区大国与其关系以及胡塞领导人宗教政治思想等。^② 鉴于此，本文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着眼于胡塞武装的发源地也门萨达地区部落社会与现代国家的互动关系，揭示胡塞武装的兴起植根于萨达地区部落社会与现代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对抗和妥协中，并思考胡塞武装崛起的政治影响。

一 胡塞武装的社会基础：萨达地区部落社会的分布与特征

2011 年以前，胡塞武装的活动及其与政府的冲突集中于也门北部的萨达省及其周围地区。萨达省位于首都萨那市西北 240 公里处，全省 1 万多平方公里，与沙特阿拉伯接壤，不仅是也门裁德派（Zaydis）的聚居中心，也是统治持续了近 1000 年的裁德派伊玛目国家的政治中心。在也门，萨那以北通常被称为“部落之地”，“与其说部落主义是一种像钟表一样精确的机械装置，还不如说是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③。部落组织在规范当地人生活方式、价值与政治观念方面都显示出异于寻常的强大社会力量，培育出区域性的政治文化，导致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感觉处于无意识，而对村庄、家庭和宗教这些分散的结构却有着非常强烈积极的认识、情感与评价。^④

① 相关成果参见吴天雨、吴冰冰《也门宰德派的兴衰与胡塞武装的政治抗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3 期；朱泉钢《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及其治理困境》，《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第 4 期；李翠《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局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8；马小龙《也门“胡塞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6；等等。

② Barak A.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uthi Phenomenon*, St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Marieke Brandt, *Tribes and Politics in Yemen: A History of the Houthi Conflic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7; Andrew McGregor, *Shi'ite Insurgency in Yemen: Iranian Intervention or Mountain Revolt?* Alphascript Publishing, 2011.

③ Paul Dresch, "Trib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History in Upper Yemen," in Brian Pridham, ed., *Contemporary Yemen: Politic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London: Croom Helm, 1984, p. 171.

④ 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 146 页。

（一）萨达地区的部落分布

萨达地区是凯赫兰·本·埃米尔（Khawlan bin Amir）和巴基勒（Bakil）两个部落联盟的家园，分布着属于凯赫兰·本·埃米尔部落联盟成员的五个部落：萨哈尔（Sahar）、拉兹赫（Razih）、祖玛赫（Juma'ah）、穆纳比赫（Munabbih）和与部落联盟同名的凯赫兰部落。每个部落之下又分为众多的小部落，这些部落历史悠久，其家族历史多可追溯 700 ~ 800 年以上，其中祖玛赫部落历史长达千年。

凯赫兰部落领地集中在肥沃的西部山区，该地区自古以来就以农业和高度发达的灌溉技术而闻名。按照其规模和人口密度，其部落领地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海丹（Haydan）、萨盖恩（Saqayn）和阿尔-查希尔（al-Zahir）。祖玛赫部落领地集中在萨达盆地，其领地也分属三个行政区域：玛齐兹（Majz）、巴基姆（Baqim）和卡塔尔（Qatabir）。拉兹赫部落位于苏拉维特（Sarawat）山脉西部山麓，东南面是肥沃的河谷土地。历史上拉兹赫部落领地是各大部落与统治者争夺的要地，萨达省的大部分人口也多集中于此。穆那比赫部落领地位于南部和东北部的较低山区，地处偏远并长期保持着相对自治的传统。位于萨达盆地的萨哈尔部落长期以来一直是栽德派伊玛目的宗教和政治中心，该部落环绕的萨达既是市场、军事要塞还是该省的政治中心。相邻的焦夫与阿姆兰省与萨达省交界的地区则属于瓦拉赫（Wailah）、达乎姆（Dahm）和素夫言（Sufyan）三个部落的领地。

（二）萨达地区部落社会的特征

也门传统部落的核心标识是“血缘关系”，但近代以来部落更强调基于地域身份认同基础上有着血亲关系的人们集合体，是山区农村社会的核心组织。多山地的地形条件决定了萨达地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与管理上的长期自治。

1. 分裂型部落社会传统和强烈的地域认同观

萨达地区对部落的称呼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区对各级谱系的认定也完全不同。如“卡比拉”（Qabila）一词可以指一个包含十几个子部落的大部落，也可以指某个子部落或部落中的某个家族，一个卡比拉可以分为 3

个、4 个或者 10 个亚部落 (Subtribe/Fakhdh)。因此研究萨达省的学者认为,“当地部落是一个政治实体,如国中之国”^①。萨达省最西边的部落通常是在当地“拥有政治边界和实行内部管理的政治实体”^②。受地形条件限制,萨达省内大多数人口集中在萨达盆地周围,西部山区沿线人口居住分散,全省有 1126 个居民人数少于 30 人的村庄,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也只有 200~500 人。当地部落没有游牧的传统而长期以定居农业为生,民众产生对土地的依恋和基于地域之上的认同感。如诗歌中描述的:“一位部落民的荣誉植根于他的土地上。”^③当代萨达省内的行政区划是沿着现有部落领地的边界划分的。因此,萨达地区部落社会以谱系为基础,沿着地理边界分裂为众多相互独立、松散的社会实体。部落社会基本都拥有各自的首领、经济上自给自足、管理上自成体系同时兼具军事功能。

2. 以荣誉为核心的部落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

在也门部落文化中,荣誉的含义涉及个人到部落的集体行为、家庭到部落整体等多个层面。对个人而言,荣誉包括保护自己的土地、财产、武器,攻击住所、偷盗及放火等都是破坏个人荣誉的侮辱性行为,此类行为扩大到部落层面就是“部落荣誉来自其领地范围内的不可侵犯性”^④。部落必须对各类侵犯荣誉的行为做出回应,其主要的行为规则是依据部落社会自成体系的习惯法与调解机制。部落习惯法是以一系列规则规范部落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非部落民的权益;与其相辅相成的是部落调解机制,所有涉及部落的争端都要寻求调解或仲裁,冲突双方将象征自身荣誉的腰刀或武器交给调解人,较小争端或涉及妇女利益的也可上交手表或首饰等,这一程序寓意为双方的平等性,也表示双方已经提交调解的诉求,武器、腰刀或手表在调解结束后会退回。部落间的调解通常是三个到四个谢赫轮流进行,通常涉及部落联盟间争端的最终协定的达成需要几十位谢赫进行

① Barak A.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outhi Phenomenon*, St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p. 48.

② Marieke Brandt, *Tribe and Politics of Yemen: A History of the Houthi Conflic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7, p. 75.

③ Najwa Adra, “Qabyala: The Tribal Concept in the Central Highlands of the Yemen,” Ph. D. diss., Temple University, 1982, p. 145.

④ Paul Dresch: “Trib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History in Upper Yemen,” in Brian Pridham, ed., *Contemporary Yemen: Politic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London: Croom Helm, 1984, p. 58.

调解和签字。^① 据 2012 年统计数据，也门有 70% ~ 80% 的纠纷仍是通过部落习惯法解决。^② 这一数据一方面显示出也门国家司法系统的疲软；另一方面则表明部落习惯法和习俗在维持部落社会运作与稳定中的作用。

3. 通过捍卫武器表达的部落自治权

部落中的武器不仅是用来自卫、打猎和劫掠的工具，更是一种身份和个人荣誉的象征。也门成年男子日常服饰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佩戴腰刀，象征个性、自由和个人信誉；也意味着佩戴者拥有一定的武力，部落将腰刀、枪支等武器视为荣誉和拥有自治权利的象征，是代表部落联盟关系的信物。“伴随着 20 世纪欧洲现代武器的传入，自由地拥有和携带武器逐渐成为部落男子身份的象征。”^③ 在也门，部落各类活动如婚礼、集会中都会出现枪支，“枪支武器所代表的是社会规范与传统，而不是暴力与杀戮”^④。因此，抢夺或破坏部落男子的武器、冲突双方拒绝上交武器到中立方等都是侵犯荣誉的行为，即使是中央政府也须遵循这一原则。在这一秩序中，部落不论大小，基于血亲关系，每个部落成员都有责任保护本族成员，并攻击外敌。萨达地区的部落受本省政府的直接管辖。但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能否顺利贯彻，并不取决于政府，而是有赖于当地部落谢赫对政府支持的程度。

总之，部落构成了萨达社会的基本单位，是集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封闭的社会实体。基于固定边界上产生的地域认同、以荣誉为象征的部落价值体系和长期的自治传统共同构成胡塞武装在萨达地区兴起的社会环境。

二 国家与萨达部落对社会控制力的博弈： 胡塞武装兴起的深层因素

“国家与社会”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

① Najwa Adra, *Tribal Mediation in Yemen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Development*, Andre Gingrich & Guntram Hazod, 2011, p. 2.

② Erwin Van Veen, *From the Struggle for Citizenship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Justice: Yemen from 1990 to 2013*,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2014, p. 39.

③ See Gavin Hales, “Guns in Yemen: Culture, Violence and Realpolitik,” paper represented at the Guns, “Crime and Social Order: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York University, May 14, 2008, p. 75.

④ Essedine Saeedal-Asbahi, “Arms in Yemen: A Source of Pride or Instability?” (Part I) *Yemen Times*, December 8, 2009, p. 9.

热点问题之一，其经典论述源自洛克和黑格尔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结构所形成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两种分析路径。2009 年美国学者米格代尔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理论分析范式，他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为实现社会控制而进行的决定性的斗争”^①的过程，社会控制是“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中的关键要素。当代西方学者中安东尼·葛兰西的“公民社会”、迈克尔·曼的“基础权力”以及阿尔弗雷德·斯泰潘的“政治社会”等指出现代国家在社会之中构建了自身独特的政治基础等。我国学者汪仕凯在上述理论基础上丰富了“政治社会”理论，他指出政治社会作为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政治基础，在冲突与对抗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种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维度，明确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支持关系^②，为我们审视与反思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综合学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更偏重于以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分析路径考察也门现代国家与萨达部落社会的互动关系，既强调两者之间对抗、冲突的一面，也注重两者间的相互妥协和支持。本文集中于探究在国家与萨达部落社会对抗与融合的过程推动胡塞武装兴起的政治、经济 and 宗教文化因素，避免陷入机械套用范式的思维。

作为阿拉伯地区较早脱离殖民统治，宣告独立的国家，也门从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到统一的共和国，国家作为全体民众的代表，在外交、战争、国际问题处理等方面具有内在优势，在涉及征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并努力实现社会控制以不断加强国家能力。面对国家社会控制力的持续加强，萨达地区的部落社会凭借强大的习俗法规和文化保持着对当地社会实际的控制权。两者的互动博弈中，部落社会既有积极适应国家管理的一面，同时对现代国家加强社会控制的抵触与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

(一) 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时期对萨达部落社会的权利剥夺

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是栽德派伊玛目国家，其统治中心位于萨达地区。

① [美] 乔尔·S.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 58 页。

② 汪仕凯：《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到政治社会理论：再论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76 页。

伊玛目通过古老的人质制度和干预部落谢赫的任命加强对部落社会的控制以稳固自身的统治。

(1) 实行人质制度。伊玛目叶海亚 (Yahya) 和艾哈迈德 (Ahmad) 时期扣押了大量来自部落的人质, 对萨达地区部落人质选择尤为重视和谨慎。伊玛目要求拉兹赫部落中每个谢赫都需要将其亲人交出充当人质, 但通常被扣押数月后可以由其他亲属替换。萨哈尔部落中谢赫的儿子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远离其部落成为人质, 部分人质甚至被囚禁和杀害。拉赫班 (Rahban) 的穆贾里 (Mujalli) 是谢赫家族首领, 还是萨哈尔部落的大谢赫, 这种重要身份使谢赫法伊德·穆贾里 (Fayid Mujalli) 的儿子侯赛因在萨那、哈贾 (Hajjah) 等地的监狱中度过其 20 岁之前的大部分时光^①, 通常人质满 15 岁被更年轻的亲属替换后就能返回, 15 岁后不能返回的人质会被锁链束缚以限制其活动。人质制度反映出伊玛目既需要部落的支持又忌惮于部落力量。

(2) 干预部落谢赫的任命。萨达部落的谢赫选举实际上长期掌握在固定的谢赫家族中。对不服从统治的部落, 伊玛目直接操控该部落的谢赫选举, 甚至直接重组整个谢赫家族的谱系, 以保证伊玛目内定的人选当选。1911 年的《达安条约》中承认了伊玛目叶海亚在其治下拥有任命官员和法官的权力, 部落习惯法中赋予谢赫司法功能, 这给予了伊玛目干预谢赫选举的法理基础。一旦部落谢赫出现空缺, 伊玛目提名候选人同时打压其他候选人, 或直接任命官员将部落谢赫架空, 如干预成功, 伊玛目立即任命更多忠诚于自己的部落谢赫以获得稳固的权力和统治合法性。^② 1962 年革命前, 王储阿卜杜拉·本·哈桑 (Abdullah bin al-Hasan) 对其所管理的萨达地区谢赫推行强硬的取代政策, 甚至直接杀害试图反抗其统治的谢赫, 统治者对传统部落忠诚和习俗的公然挑战激起了众多部落的强烈反抗。

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时期的强硬控制政策对萨达地区部落的传统自治权造成较大的冲击, 有些部落的谢赫家族被彻底取代。尽管短期内加强了伊玛目的统治, 但引发部落对伊玛目统治的排斥和不信任感。1962 年革命

^① Marieke Brandt, *Tribes and Politics of Yemen: A History of the Houthi Conflic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7, p. 42.

^② Wenner Manfred, *Modern Yemen: 1918 - 1966*,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p. 31.

期间遭受伊玛目打压的部落及谢赫家族是最早选择支持共和派反对君主派的力量。

(二) 北也门共和国时期萨达部落社会的重组

1962 年“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伊玛目的统治，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简称北也门共和国），首都由萨达迁往萨那。伊玛目巴德尔（al-Badr）及其支持者以萨达为据点与共和派爆发内战。

(1) 内战时期萨达地区部落社会的分化。作为栽德派的中心，萨达地区大多数部落选择继续支持伊玛目的君主派，被共和派描述为“伊玛目王国的堡垒”。^①实际上，栽德主义（Zaydism）并不是部落保持忠诚的唯一准则，血亲、姻亲关系、复仇传统、利益需求等都左右着部落的立场。革命时期萨达较低等级的谢赫阶层因为与君主派谢赫的竞争关系，或曾遭受到伊玛目迫害转而支持共和派。被君主派视为大本营的拉兹赫部落在内战期间发生分裂，内部既有坚定支持君主派的大谢赫阿里·艾哈迈德·阿萨姆（Ali Ahmad al-Azzam），也有公开支持共和派的艾勒特·法拉赫（Ilt Farah）部落的纳兹尔（al-Nazir）谢赫家族。^②穆纳比赫的大谢赫是凯赫兰部落联盟内唯一支持共和派的部落首领。在属于君主派阵营的萨哈尔部落内，伊玛目时期受到迫害的谢赫家族多选择支持共和派，他们加入“萨达旅”参加了保卫萨那市的“七十天战斗”，还成为萨达地区对抗君主派的重要力量。部落谢赫与其部落成员之间、所属同一部落的不同小部落之间甚至是同一家族内部因为对立的政治立场而出现严重的分裂，原本以对抗维持的内在权力平衡被打乱。

(2) 内战结束后萨达部落社会的重组。尽管萨达存在亲共和派的部落，但打败君主派是共和派依靠哈希德部落联盟从外部强制征服萨达地区的结果。1980 年政府才向萨达派遣官员，共和政府对萨达的管理多采取与当地部落合作的方式。首先，与当地赛义德（Sayyid，圣裔）合作。省级和市级的政府工作人员由较高地位的外地人或受过教育的萨达地区赛义德担任。

① Marieke Brandt, *Tribes and Politics of Yemen: A History of the Houthi Conflic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7, p. 45.

② Meissner Jeffrey R., "Tribes at the Core: Legitimacy, Structure and Power in Zaydi Yemen,"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87, p. 87.

赛义德进入政治系统中是基于其家族关系、教育程度、专业知识、政府工作经历和在当地的声望。如1970年，来自著名赛义德家族的阿卜杜拉·叶海亚·萨迪（Abdullah Yahya al-Sadi）被任命为萨达省省长。实际上，赛义德家族与政府合作更多是无奈之举，因其大部分财产都被政府没收，宗教地产被国家收回或被共和派谢赫瓜分，大多数部落和宗教领袖只是“适应了新的政权，许多人直接支持它并接受他们自己的政治衰落”。他们从伊玛目体制下传统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职位上走出来，在非政治的领域里重组自己，就像新兴的商人阶层一样。^①因此，许多裁德派部落领袖在保持他们的传统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只是选择使他们的身份屈从于共和国权力支配体系。其次，共和派谢赫的崛起。参加萨达旅的谢赫侯赛因·穆贾里（Husayni Mujalli）、叶海亚·侯赛因（Yahya al-Husayni）等政治地位提高并获得更多利益。与传统谢赫世系相比新的谢赫家族崛起在当地被称为“谢赫革命”，主要有巴尼·苏拉伊姆（Bani Suraym）部落的阿里·祖勒丹（Ali Jualydan）家族和穆纳比赫部落的同名家族，其中后者共和派的政治立场使阿里·侯赛因·穆纳比赫从寂寂无名的部落成员一跃成为财力雄厚的政治家、当地市场和商业活动的翘楚，并迅速与当地大谢赫艾复凡（Awfan）家族联姻，此前这个家族从不与部落之外的家族联姻。最后，前君主派谢赫的边缘化。萨哈尔部落原大谢赫迪尔达赫·本·贾发赫（Dirdah bin Jafarhe）家族受到新崛起的穆纳比赫家族的冲击。大部分君主派谢赫在20世纪80年代转向支持共和政府，“与他们之前坚决反对的共和国政府合作，条件是继续保持其部落制度和特权地位”^②。北也门共和国政府对当地的管理仍以间接管理为主，动荡的政局使得国家对萨达地区的社会控制始终表现为碎片化的特征。

（三）也门统一后国家对萨达地区社会控制的困境

1990年也门国家实现统一，萨利赫借助西北高原地区的部落势力逐步构建了威权主义政治统治模式，而萨达地区在政治上被进一步边缘化。

1. 恩惠政策与萨达部落的政治边缘化。恩惠政策在中东国家部落政策

^① Gabriele Vom Brack, *Islam, Memory and Morality in Yemen: Ruling Familie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05, p. 5.

^② Paul Dresch, *Tribes, Government and History in Yem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19.

中较为常见。在也门，萨利赫政府借助恩惠政策获得和巩固部落的支持。对萨达地区的部落主要是拉拢共和派部落，压制曾经加入君主派阵营的部落。对支持政府的部落，谢赫采取支付薪水、赠予汽车和房子等财物的方式，可以优先获得在萨达省内或军队中的职位；政府出资为其在这类部落领地内修建道路、改善交通。1994 年夏季内战中，萨达部落武装曾与南方军队作战，与沙特接壤地区的小部落还承担着保护边界的作用。因为各部落重要性的不同，享受“恩惠”的政策也存在差异。长期来看，差异化政策激化了当地部落间的潜在矛盾。政府在与有声望的谢赫对抗中通常被迫让步，无形中强化了部落的自治观念和以对抗方式获取权益的意识。实际上，在平衡各方势力中与哈希德部落结盟一直是萨利赫统治的基础，来自萨达的谢赫始终被排除在政府权力核心之外。1993 年议会选举中，全国人民大会党候选人在西北高原地区获得 63% 的支持率，而在也门北部其他地区包括人口最稠密的中西部地区只获得 31% 的支持率。1993 年选举的结果表明西北高原地区部落权贵垄断着国家政治权力。一位观察家指出“选举证明也门的政治分化是沿着地理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界限”^①。

2. 部落社会仍是萨达地方管理的基础。萨达省下设 15 个区，各区下又设分区，居民受本地区委员会管理，由萨利赫总统任命省级和各区级负责人。1962 年至 2000 年萨达省已经先后有 22 位省长任职，频繁更迭人选显示出政府在当地管理的困境。萨达省内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官员大部分仍由当地部落谢赫出任。2000 年在胡塞家族活跃时期，被任命为萨达省省长的叶海亚·阿里·阿姆里 (Yahya Ali al-Amri) 着手加强对省内各级部门的管理。面对萨达以部落为单位高度个人化的政治体系，阿姆里试图不惜任何代价将国家主权强加于部落利益之上。但在他视察海丹等地后，发现各地检查站不属于国家控制，有影响力的部落谢赫占据着大部分管理职位，无奈表示“萨达省所有的行政职员都来自部落”^②。

3. 萨达战争对当地部落规范的冲击。在 2004 ~ 2010 年持续 6 年的萨达战争中，政府与胡塞武装都将部落作为动员和拉拢的主要对象，大量部落卷入战争冲突。战争中对部落领地的破坏、部落民的流离失所、袭击裁德

① Carapico Sheila, "From Ballot Box to Battlefield," in *Middle East Report*, Vol. 25, No. 1, 1994.

② Marieke Brandt, *Tribe and Politics of Yemen: A History of the Houthi Conflic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7, p. 150.

派圣地和清真寺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当地部落声誉，而且暴力行径破坏了当地部落文化中以合作、调解为核心的部落主义价值体系和规范。如部落间发生冲突的常见因素是封锁对方的道路，但战争中政府军的封锁行为是针对整个地区而不是某个部落，部落认为是对其自治权的否定。上述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萨达民众倾向选择以暴力方式而不是传统调解方式回应战争带来的破坏。2007年有国际机构研究报告强调，在萨达及其相邻的马里卜和焦夫省部落间与复仇相关的暴力和冲突活动愈演愈烈，这是部落传统调解机制失效的直接反映。^①一位萨达记者曾表示，招募部落力量时，政府错误地使用了历史上就是萨达地区巴基勒部落联盟最大对手的哈希德部落，这直接导致萨达民众认为政府与胡塞武装冲突的本质是部落性质的。^②战争并没有使传统部落规则完全崩溃，萨达各社会力量仍按照一系列复杂的部落价值规范民众，但对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始终存在，并更多地体现为部落等社会力量对国家实施社会控制的抵触与反抗。

面对也门现代国家持续加强的社会控制，萨达部落仍通过传统习俗和规范保持着在当地社会的控制主导权，并足以阻碍国家行政、法律与政策的执行。两者间对社会控制权的竞争使得当地部落社会对政府产生排斥与不信任感，政府的不平衡政策加剧了部落的不满，也成为胡塞武装在当地获得支持的重要原因。1994年胡塞武装的前身“青年信仰者”组织的第一届夏令营在萨达北部著名的哈希米领地哈玛扎特（Hamazat）开办，并吸引当地凯赫兰和巴基勒部落联盟中的谢赫家族成员参加。

同时，国家长期实行的“恩惠”政策以国家实力受到侵蚀为代价强化了当地部落力量，实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能力受限。面对“青年信仰者”组织和胡塞家族影响力的提升，萨利赫政府试图通过打击胡塞家族实现社会控制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萨达战争期间政府军的强势行径使当地传统部落调解机制基本陷入瘫痪，也直接推动了胡塞武装在维护萨达地区传统利益与宗教的旗帜下建立了受到广泛支持的反政府组织。

① Laila al-Zwaini, "State and Non-State Justice in Yemen, Paper Re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Justice Systems in Afghanista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December 2006, p. 8.

② Barak A.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uthi Phenomenon*, St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p. 259.

三 现代经济对萨达部落社会的渗透与冲击： 胡塞武装兴起的社会基础

萨达省地形多样，西部群山环绕，东部多平原。萨达市及其周围属于地形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盆地，传统经济以种植业为主。在大多数地区干旱炎热少雨的气候条件下，当地形成了基于家庭、村庄和部落等社会网络基础上的集水、蓄水灌溉方式，“多以部落为单位共同应对旱涝灾害和组织生产，部落中长期保持着男子负责耕种，女子负责牲畜饲养的分工，由此形成以谢赫主导的集体劳动的生产模式”^①。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建立，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萨达地区经济、人口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不断冲击着传统部落价值观念和宗教文化。在这一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萨达青年，成为“青年信仰者”组织和胡塞武装的支撑力量。

(一) 现代经济冲击下萨达部落社会的变化

1. 部落人口流动与地区意识的增长。1979 年萨达与首都萨那之间的道路竣工，使 10 个小时的车程缩短为 4 个小时，同时省内及其与邻近省份阿姆兰的道路状况也得到改善。道路交通的改善使长期自给自足的萨达地区经济融入全国性市场经济中，当地居民努力提高农产品产量并销往其他地区以获利，同时与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区的跨境贸易和走私活动活跃。20 世纪 80 年代约有 1/3 甚至一半的萨达男性参与跨境经济活动^②，经济活动频繁，当地居民收入和购买力增强，新的灌溉和机械等技术被引入农业生产，同时也冲击着当地以集体协作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形式。

随着萨达盆地经济的发展与相对繁荣，萨达省内各地区交往增多，如拉兹赫部落民开始了解卡塔尔和萨哈尔部落的概况。部落间频繁的交往有助于打破部落、家族意识，形成民众对萨达社会的共同情感。20 世纪 80 年代，大量十几岁到三十岁的萨达青壮年男子通过商业、求学和海外打工

^① Sheila Carapico, *Civil Society in Yem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ctivism in Modern Arab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4.

^② Marieke Brandt, *Tribe and Politics of Yemen: A History of the Houthi Conflic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7, p. 112.

接触到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前所未有的经济交往和人口流动使分属不同阶层的群体间流动性增强，部落民与非部落民、赛义德与非赛义德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①此外，省内各地区商人和赛义德多迁入萨达市，哈希德、巴基勒和凯赫兰部落联盟所属的部落民也逐渐聚集于此，分属三大部落联盟的部落民在土地、水和商业机会等方面的竞争关系导致部落间冲突增加，同时也带来此区域管理的真空化。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为“青年信仰者”组织早期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接触到外部世界的青年群体思想活跃，关注地区利益时意识到中央政府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的忽视，由此产生的不满加上政治参与的热情转为对致力于实现宗教复兴的“青年信仰者”组织的支持。

2. 部落社会传统阶层的分化整合。萨达传统农业灌溉通过以部落为纽带的数百个小集水区，在当地组成多个以合作为基础的“利益纽带”。农民以集体行动组织共同的生产生活，每个集水区内的“利益纽带”受到部落内习惯法的约束。^②现代经济活动改变了以合作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生产。一方面是农民收入增加和灌溉机械的引入使开展大规模农业投资活动成为可能，部落土地集体所有制被大规模土地私有化所取代；另一方面是青壮年劳动力赴海外打工造成当地劳动力不足，也门所进口小麦的价格比起种植成本要低得多。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口和部落进入萨达，财力雄厚的谢赫、哈希米家族和非部落的商人从底层部落民中大规模购入土地，来自萨达盆地之外的部落谢赫也在购买当地部落的土地。^③返乡的打工者凭借积蓄购买土地或在当地从事商业活动。利益重组打破了萨达地区社会阶层的相对平衡，处于部落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人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不少拥有声望的传统家族或成员陷入贫困境地，经济地位与传统的社会等级规范出现错位。

3. 部落忠诚感的弱化。1975年，也门89%的常住人口是农村人口，其

① Gerhard Lichtenthaler,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Role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Economy, in North Yemen*, Ashgate Publishing, 2003, p. 9.

② A. G. Milroy, "Arid Lands Initiative Yemen: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March 1, 2020, <https://al-bab.com/yemen-development-through-co-operation>.

③ Peterson. J. E., *Tribes and Politics in Yemen: Arabian Peninsula Background Note*, No. APBN - 007, <http://www.J.E.Peterson.net>, December 2008, p. 16.

中 74% 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还有 5% 的人从事建筑业。^① 成千上万的也门男子（大部分是年轻人）迁移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从事非技术工作。他们把收入寄给国内亲人，改变了当地传统经济自给自足的状态。商业的渗透带来部落社会内部不平等与忠诚感的弱化，现代打井和抽水灌溉短期内解决了农业用水，但从长期看不仅破坏了萨达地区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而且切断了以合作为基础的社会纽带，部落内部对土地和灌溉权的争夺日益明显。与政府关系密切并且较为富有的谢赫有机会获得更多土地，谢赫更关注自身的土地财产和政府的代理人身份而不是部落的整体利益，导致与自身所属部落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谢赫更关注政府政策动向而不是部落成员的诉求，传统上谢赫通过发挥仲裁者和调解者作用所建立起来的部落威望开始下降。如出现部落民拒绝向自己的谢赫出售土地，或者重新选举部落谢赫以取代现有谢赫的现象。随着部落联盟、部落和小部落甚至家族层面忠诚感降低，谢赫作为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以及各部落之间冲突调解者的作用逐渐减弱，可以说“也门社会在近几十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部落规范和价值体系已经被削弱”^②。

传统等级阶层的重组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等级，渴求变革的青年群体迫切要求打破部落身份的限制，成为“青年信仰者”组织迅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部落内部忠诚感的削弱一方面使得作为政府与民众纽带的谢赫更关注于自身利益，引起部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另一方面部落传统调解机制的削弱加剧了部落社会内部的冲突与碎片化，实际上增加了政府实现社会控制的难度。

（二）国家经济政策的失衡与战争影响下的萨达部落社会

1. 萨达部落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日增。与政治上的边缘化相似，也门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并没有过多考虑萨达地区的经济状况，经济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向萨那市和哈希德部落联盟控制的高原地区倾斜。萨达省一直是也门最偏僻和贫穷的省份。1990 年海湾危机爆发，近 100 万也门海外打

① Yemen Arab Republic, *Central Planning Organisation*, Sanaa: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6, 1987, pp. 49, 59.

② Helen Lackner, *Yemen in Crisis: Autocracy Neo-Liberalism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a State*, London: Saqi Books, 2017, p. 343.

工侨民被迫返国，萨达地区人口数量在1975~1994年增加了4倍。^① 具有海外求学或工作经历的新一代青年进入政治成熟期，对比曾经求学或打工之地的海湾国家，他们强烈感受到萨利赫政府对萨达地区基础设施和福利设施的忽视。同时作为凯赫兰和巴基勒部落联盟的成员，他们意识到政府的政策只是为了帮助哈希德部落联盟实现对萨达地区的蚕食，萨达政治边缘化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加深。此外，萨达省内15个行政区有9个与沙特阿拉伯接壤，这种边界划分是政治边界，而不是部落边界。省内凯赫兰部落联盟和瓦拉赫部落各下属部落就分布在国界两侧居住生活。部落间的联姻、贸易活动甚至日常生活都往来频繁，因此萨达地区走私经济活跃，最重要的是这种非法经济活动在萨达地区不仅仅是当地经济的一种补充，还被认为是符合部落习俗的合法行为。长期以来，跨境走私贸易为萨达北部地区带来丰厚的利润，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私产品总量占萨达总进口量的25%~50%。^② 90年代开始，萨利赫政府加强了对萨达省内跨境贸易的监管。政府对走私活动的打击迫使许多居民重新依靠农业为生，但“走私仍是当地人首选的生计方式，并日渐成为普通民众对抗国家权力和控制力的象征”^③。实际上国家的监管行为更多地将利益分配到了其盟友哈希德部落联盟手中，严重损害了萨达地区部落与民众的利益。

政府无法为省内商业发展提供足够的机会，萨达地区商业部门和活动由当地有影响力的谢赫和商人操控。这类部落商业精英与政府合作在省内建立医院、政府办公场所、学校和供水系统，国家在萨达省内的影响力实际上是通过部落权力结构施加的。谢赫通过商业活动积累财富并成功地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在当地获得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④ 在萨达，侯赛因·胡塞向本地商人募集资金致力于改善萨达地区的基础设施

① Barak A.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outhi Phenomenon*, St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p. 118.

② Dumm Andrew, "Understanding the Houthi Conflict in Northern Yemen: A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master's 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2010, p. 63, ProQuest,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88313726>.

③ Dumm Andrew, "Understanding the Houthi Conflict in Northern Yemen: A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master's 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2010, p. 63, ProQuest,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88313726>.

④ Marieke Brandt, *Tribe and Politics of Yemen: A History of the Houthi Conflic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7, p. 66.

和医疗、学校，并呼吁萨达省实现自治的诉求为其赢得了威望和声誉。

2. 萨达战争的破坏。持续 6 年的战争使得萨达地区的拉兹赫、海丹等部落领地在数次冲突中受损严重，大量传统的赛义德领地或圣地被毁，由此引发的栽德派和哈希米家族名誉受损，唤起了当地部落的共同责任感。此外，城镇基础设施被破坏和社会福利下降加剧了民众的不满，一位全国人民大会党（CPC）官员表示：“胡塞武装的支持者日增，并不全是宗教原因，而是当地民众感到受到歧视并被排除在发展政策之外，不幸的是，城镇的毁损加剧了这一现象。”^① 战后也门政府向国际捐助者申请了 190 亿美元用于重建萨达的基础设施和难民安置，而实际上这些款项并未有效用到萨达地区。^② 持续数年的冲突不仅加剧了国家分裂，同样显示出国家与军队的羸弱。

从“青年信仰者”组织到萨达战争中的胡塞武装，它们兴起的基础一方面是现代经济活动冲击破坏了部落社会基于合作的社会模式并弱化了部落社会的传统等级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长起来的萨达青年中产生共同的地区意识。另一方面传统调解机制的弱化使得部落社会内部冲突加剧，中央政府以分化和拉拢寻求短暂平衡的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国家机构权威性的进一步削弱。面对当地经济的落后和中央政府的羸弱，渴求变革与进步的当地青年群体迅速崛起，在支持“青年信仰者”组织以真理党身份合法参与政治失败后，转向以武装叛乱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碎片化的部落社会和国家在行政管理与经济上控制的乏力都为胡塞武装迅速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

四 国家对栽德派的打压与栽德派复兴运动： 胡塞武装兴起的直接因素

也门历史上长期由政教合一的栽德派伊玛目王国统治，栽德主义是伊玛目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共和政府建立后，栽德派逐渐在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Yemen: Defusing the Saada Time Bomb,” in *Middle East Report*, No. 86, 2009, p. 13.

^② Barak A.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wleine,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outhi Phenomen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pp. 246–248.

政治上边缘化。1990年也门国家统一后，政府对宗教力量多采取包容、整合和拉拢等策略。萨利赫政府对栽德派政策出现了从扶持拉拢到打压反目的转变。栽德复兴主义运动的出现及其与政府的对抗成为胡塞武装兴起的直接原因之一。

（一）萨达地区栽德派宗教阶层的传统核心地位

897年，因调停部落争端受邀来到也门的哈迪·叶海亚（Hadi Yahya）以萨达为中心建立了栽德派伊玛目国家。他对部落习俗的尊重及其调解人的身份奠定了伊玛目国家栽德派与萨达地区部落社会宗教文化融合的基础，确立了萨达地区栽德主义的核心地位。

与部落主义一样，栽德主义也规范着当地的价值观念和习俗。栽德派核心原则是号召群众反抗暴政、具备接触宗教知识和优秀品德的赛义德的后代才有资格出任伊玛目，因此赛义德处于社会宗教阶层的首位，低一级的是非赛义德出身的伊斯兰教法学家（Fuqaha），其功能类似于乌莱玛（Ulama），主要是为栽德法律、神学和伊玛目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解释。在萨达，赛义德家族中的哈希米家族（Hashimis）成员处于社会等级的顶端，他们通常被伊玛目委以重任并享有多种特权。尽管赛义德地位世袭，但处于显贵地位的家族并不多，大多数赛义德家族“在政治和经济生产中并没有占据固定职位……教书、耕种等，不能完全确定他们都属于统治阶层”^①。赛义德与当地部落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赛义德具有部落调解人的身份，同时部落有义务为赛义德提供保护并将此作为部落荣誉的一部分。非赛义德出身的伊斯兰教法学家能在教法原则下仲裁部落习俗的有效性，在他们的努力下部落传统荣誉观能很好地与伊斯兰教法协调一致，共同构成萨达社会的司法体系。栽德派历史上曾将部落习俗视为魔鬼，栽德派教法学家则以栽德法律的灵活性将宗教教法合法性置于部落法规和调解之上。他们以卡迪（意为法官）身份参与国家管理中。尽管在理论上任何部落民都可以成为卡迪，但实际上卡迪身份世袭。与赛义德相似，他们多以“干预”身份调解部落冲突、继承和婚姻争端。成为栽德宗教社会精英阶层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家族继承；其二是通过自己努力学习获取。在现实中赛义德

^① Paul Dresch, *Tribes, Government and History in Yem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141.

与非赛义德之间也存在身份重叠，如并不是所有的赛义德都是知识分子，同样卡迪多是通过自身学习获得特权地位的部落民，至近代上述阶层间的通婚也日益普遍。

(二) 现代国家对栽德派的打压与栽德复兴运动的兴起

20 世纪 60 年代，北也门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栽德主义丧失了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共和国政府不仅将首都从萨达迁往萨那，而且剥夺传统赛义德家族的特权地位，限制栽德派宗教学校和出版机构的权利。栽德主义被边缘化的形势下，一些栽德派宗教领袖及其后裔故意在公共场合掩盖他们的家族血统，甚至修改他们的姓氏。^① 如曾经享有盛名的哈希米家族在共和国时期常遭受歧视和打压。一些哈希米家族以周围部落名称替代其家族的姓氏，甚至有些家族成员不再担任栽德派宗教领袖转而同部落或非部落成员合作从事商业活动。哈希米家族地位下降迫使其与当地胡塞家族联姻，两者通过联姻所构建的亲属网络为胡塞武装在当地构筑起多个重叠的利益网络。当也门政府利用社会阶层间的不满打击胡塞家族时，支持胡塞与政府交恶的就包括多个在萨达拥有声望的赛义德家族。

也门历史上各王朝对待宗教势力的政策多以拉拢、分化为主。为了打击栽德派宗教势力，20 世纪 80 年代共和政府选择扶持传入也门的萨拉菲派。面对萨拉菲派在也门形成以达玛吉哈迪斯家园为核心的包括清真寺、学校等的活动中心，萨达地区有影响力的栽德派学者开始了早期栽德文化复兴活动，主要表现为建立清真寺和学校、印刷栽德教科书和小册子、组建教师培训机构、举行栽德特有的宗教节日活动等。在栽德派学者出版的著作中，萨拉菲派通常被描述为：沙特向也门输出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来自沙特的“瓦哈比主义”。^② 1992 年侯赛因·胡塞在伊朗学习后回到萨达省建立“青年信仰者”组织，其目的是通过宗教教育项目使栽德派恢复在萨达以及北也门地区的绝对宗教权威地位。同时，萨利赫政府担心萨拉菲派势力坐大转而支持栽德复兴活动，使“青年信仰者”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① Gabriele Vom Brack, *Islam, Memory and Morality in Yemen: Ruling Familie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05, p. 235.

② Laurent Bonnefoy, *Salafism in Yemen: Transnationalism and Religious Identity*,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1, p. 55.

该组织的兴起既是国家整合与扶持宗教力量的结果，也是裁德宗教势力面对萨拉菲派迅速传播的回应。

（三）胡塞家族领导人与政府间矛盾加剧

20世纪90年代受到萨利赫政府支持的裁德复兴运动从防御转向积极态势，表现为以真理党（al-Haq Party）和“青年信仰者”组织为载体参与政治活动，真理党参加1993年议会选举并获得席位。在1997年议会选举失利后，侯赛因·胡塞宣布退出真理党，专注参与“青年信仰者”组织活动。

2000年之前裁德复兴运动多表现为与政府合作，双方尽力克制避免陷入冲突。2000年后两者关系日益紧张：一方面是真理党选举失利后进入议会的萨达出身的议员多以富商和与逊尼派关系密切的人物为主，他们更关注与政府的关系而不是萨达省发展失衡等议题；另一方面，政府与沙特合作开展的打击边境走私活动使萨达经济受创，侨汇收入锐减和萨那所享有的经济特权进一步刺激了大量处于失业的萨达青年。物质匮乏、政府打压裁德派、长期被边缘化所积累的不满情绪随着侯赛因·胡塞表达出强烈的反美、反犹思想^①而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除了在大量演讲中批评与美国建立反恐合作的萨利赫政府，侯赛因·胡塞还以自卫防御为理由武装“青年信仰者”组织。他宣称裁德主义在政治和文化上坚决不与中央政府妥协，强调裁德派的衰落是因为“萨拉菲派可以直接指挥阿里·穆赫欣（Ali Muhsin，也门共和国卫队指挥官，属于萨拉菲派），而裁德派在政府中没有任何人支持”^②。2004年侯赛因在给萨利赫总统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并不是反对您，我很欣赏您的巨大成就，但我神圣的国家责任感驱使我反对的是伊斯兰的敌人……美国和以色列。”^③ 侯赛因指出，萨达地区所遭遇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边缘化以及萨拉菲在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是现代裁德青年所面临的集体困境和创伤，复兴裁德主义的政

① Khaled Fattah, “Yemen: A Slogan and Six Wars,” in Asia Times Online, October 9, 2009, 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KJ09Ak02.html.

② 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uthi Phenomenon*, St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p. 121.

③ 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uthi Phenomenon*, St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p. 122.

治目的是获得广泛的支持以谋求萨达地区自治和他本人及其家族对萨达省的管理。面对侯赛因势力日盛,萨利赫选择以落后、恢复伊玛目制度、恐怖主义等定义栽德派复兴运动,对胡塞家族主要成员和支持者发布逮捕令。栽德宗教复兴运动随着侯赛因·胡塞被政府军杀害而演变为地区叛乱武装力量。侯赛因所领导的栽德复兴运动成功地团结了原本四分五裂,始终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被边缘化,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萨达社会力量。胡塞武装也成为维护萨达地区栽德派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政治代言人。

结 语

从地区宗教政治运动到国家叛乱武装再到也门当前内战中的主导政治力量,具有复兴栽德主义背景的胡塞武装强势崛起,严重冲击了也门逊尼派长期主导的政治生态和权力机构。内战爆发以来,胡塞武装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清晰,即希望在新政府中享有与其自身实力相当的政治权力。也门共和国长期由逊尼派主导的政治生态被栽德派、南方分离势力和“基地”组织等多方政治势力所撕裂,政治体系碎片化导致政治稳定遥遥无期。

米格代尔指出:“一个碎片化的社会影响了国家的特征,而国家反过来强化了社会的碎片化。”^①也门现代国家与传统部落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就诠释了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基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结构性环境使现代也门国家存在碎片化的社会控制,威权政治下的制度建设无法改变弱国家与强社会的结构关系,导致当前也门陷入碎片化社会控制与弱国家能力的恶性循环中。

以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视角考察萨达地区部落社会的变迁,面对具有分裂型社会与强烈地域认同观、自成体系的部落价值体系和自治传统的萨达部落社会,也门现代国家通过权利剥夺、分化重组和传统“恩惠”政策等手段实施的社会控制并没有实现对部落社会的有效控制。而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冲击,部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阶层流动、贫富分化等问题破坏了

^① [美] 乔尔·S. 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张长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268页。

传统等级规范并弱化了部落民对部落的忠诚情感，国家层面经济不平衡政策更成为青年一代表达政治不满的直接原因。以复兴栽德主义获得合法性和思想基础的胡塞武装的崛起正是萨达地区传统部落社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在强大社会力量表现出与国家对抗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社会与现代国家存在妥协与融合的一面，如萨达部落社会也表现出：积极融入现代政治体制、在现代经济冲击下更为开放，接受也门国家认同，其最初诉求是在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下争取更多的自治权为主，而非从也门共和国独立。总体而言，从萨利赫黯然交权到胡塞武装崛起内战爆发，也门现代国家面对着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萨达地区社会变迁思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传统部落社会的权力运动模式纳入现代国家制度中，在碎片化的社会中寻求共性的认同感无疑对破解也门政治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张向荣]